



世纪前沿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美] 小威廉·H. 休厄尔 著

**William H. Sewell Jr.**

朱联璧 费滢 译

# 历史的逻辑

## 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青院 11 000680391

# 历史的逻辑

## 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

[美] 小威廉·H. 休厄尔 著 朱联璧 费滢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美)休厄尔  
(Sewell, W. H.)著;朱联璧,费滢译.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2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  
书名原文: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SBN 978-7-208-11130-1

I. ①历… II. ①休… ②朱… ③费… III. ①历史社  
会学-研究 IV. ①K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4517 号

---

责任编辑 王子夔 张笑天  
封面装帧 陆智昌

---

**历史的逻辑**

——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

[美]小威廉·休厄尔 著  
朱联璧 费 滢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印 刷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27.75  
插 页 4  
字 数 371,000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130-1 / K · 1948  
定 价 58.00 元

## 第一章

# 理论、历史和社会科学

本书旨在发起历史和社会学科之间关于社会理论的严肃讨论。因为长久以来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互相研读对方的著作，并都在自己的著述中讨论且运用过社会理论，这已经为方才所说的理论性探讨奠定了基础。但我认为，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尚无令人满意的、关于社会理论的对话。尤其是历史学家对于社会生活的时间(temporalities)有着复杂且多角度的认识，以至于他们的观点很少进入社会理论的辩论之中。由于我在学术生涯的黄金岁月里，同时涉足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因而相信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理论上的深层交流对彼此来说都有启发意义。在本书中，我会指出这种交流将以何种面貌出现，阐释哪些议题，以及它将如何在学界各领域中引起思考。即使观点不足以令人信服，我也希望它能引来反驳的声音。我深信，唯有自由、开放、充满活力、理智的交流才能使社会理论、历史、社会科学——甚至是更为核心的——我们对社会的探索得到进步。

## 历史与社会科学

在 21 世纪初，寻求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对话算不得什么新闻。以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为例，他们于 1929 年创办颇具影响力的著名法国史学期刊《年

鉴》(Annales)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一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间,世界范围的历史学科都深受来自社会科学界方法和理论的影响。自70年代开始,社会科学界采用历史学科知识的现象也逐渐增加: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们越来越关注有关历史的演变。甚或是大体上可以说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一直以来都在共同关注一些基本的问题:社会关系是如何运作、被重现以及如何演变的,而究其根源,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都是从同一个学术分野中诞生的学科。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还有经济学,都是在19世纪8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逐渐独立和专门化的。在那之前,学者们的讨论通常游走于分界尚未明确的不同学科之间。我们该把亚当·斯密(Adam Smith)或者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当作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学家?把马克思当成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抑或认为托克维尔(Tocqueville)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志学者还是政治学家?我们往往很难用现在的标准把那个时代的学者归入某个单一的学界。直至20世纪早期,学术界才出现了用部门、职衔、课程和博士研究项目来划分的不同学科(Abbot, 1999; Clark, 1973; Keylor, 1975; Lepenies, 1988; Novick, 1988; Ross, 1991)。只有当历史学和各种社会科学之间有着足够明确的界限,才有人可以考虑发起对话的必要性。如今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大行其道的跨学科涉猎,也可以由此被看成是我们这门学科将要回归学科分野之前的黄金时代的预兆。

划分学科界限彻底改变了18世纪末或者19世纪初那种理想化的知识界图景。而“学界”也名副其实地形成了规范学术的种种限制。学科通过颁发学位,和管理课程设置、聘请教职、分配资金更加固了这种边界。历经好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当下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方法、语汇和评价标准都已截然不同,以致他们彻底变成了两个独立的学术群体。虽然不免出现“盗运”和“领土争执”,但正是由于划分学科如此有效地分割了知识领域,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才必须以跨学

科的方式进行对话。

学科之间的壁垒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日益松动。人们已经习惯了称赞在论文或者学术训练中的跨学科实践，尽管实际上这些实践并不清晰可靠，而在涉及聘请教职的时候显得尤其突出。为了在历史学研究中突破其他学科的限制，现在时常会看到具有不同学术训练背景的学者们用各式各样的理论和方法来完成他们的课题，其渊源各不相同。由此可见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每天都在进行着对话，而且它们都默契地扩大了交流范围，涵盖了对人文学科的理论借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语言学和文化研究席卷了社会科学界和历史学界，把始于文学批评和哲学的关于“意义”和“表述”的理论引入了交汇的学科中。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对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产生的影响相当，把关于意义和表征(representation)的理论(其中很多来自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带入了跨学科的讨论之中。然而这一波的交流都带着参与者各自学术背景的浓重印迹。有鉴于此，即便目前跨学科交流已经为人所熟识，我仍然乐于指出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探讨社会理论的必要性。

理论之于历史学远不及它在社会科学中那样至关重要。在19世纪末系统学科划分才刚开始的时候，史学家们旨在记录历史之独一无二的“个例”(ideographic)或“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和社会学家们力求建立(现象中)通用法则的有“规律”(nomothetic)或“辨析性”(explanatory)\*研究已经形成了鲜明对比。人们通常认为社会科学这一特性是理论和严格的研究方法使然；而尽管历史学需要谨慎处理史料，精确断代并熟练掌握叙述，却没有前者的拘谨。这一差异在两学科的研究生课程中一览无遗。社会科学的研究生在学术生涯之初都要先学习其主修科目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相反，在有这样一

---

\* ideographic 和 nomothetic 作为一对术语出现时，指的是两种获取知识的途径，前者强调个案、特性与主观现象，而后者强调普遍性、规律性和客观现象。——译者注

门课程的前提下，历史学研究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基本都是选修课程。对历史系的研究生来说，学科中最重要的训练并非必修的理论或者方法论课程，而是研究研讨班。在研讨中，研究生们学习使用一手资料和叙述历史，而不是掌握理论和本领域明确的方法以成为一名历史研究者。当他们修完课程的时候，历史系学生往往缺少系统性的理论基础，但已经可以熟练地进行研究；而社会学科的学生尽管在理论方面有深入的见解，却常对如何开始一个研究课题感到迷惘。

这种对待理论的差异将始终贯穿在两类学科的学者治学生涯中。社会科学一类期刊文章绝大部分是以有关理论的探讨开始；而历史学期刊中的论文倾向在开头写凸显其研究对象特质的内容：一段轶事或者是当代为人熟知的引文，而非理论的论述或者历史学的解读<sup>[1]</sup>。同样的差异还体现在职业的定义上，人们往往在告示上看见某职位和社会学、经济学或者政治学理论相关，但我本人从未见过招募的告示上写着史学理论。有数不清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以理论性著述享誉学界，同样以理论作品成其大名的历史学家不但寥寥无几，而且能举出名字来的几位写的大多不是纯粹的史学著作。他们之中我能想到的唯一以理论闻名的历史学家，就是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克鲁斯(Santa Cruz)分校跨学科的意识史人文类课程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 1973, 1978, 1987, 1999)。其余的比如琼·斯科特(Joan Scott)是历史学家同时也以女权主义理论为人称道；或者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钻研历史的同时也在文学理论界中有相当的地位；还有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他关于情感的社会和历史意涵的理论著作极具开拓性；以及一位主要的“后殖民”理论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他以实证性的研究成名并且在这一领域仍有著作。这些学者在历史学之外都涉足其他学科绝不是偶然<sup>[2]</sup>，他们在历史学之外的重要地位证明，理论已经不再是历史学家的禁地，但长于理论的历史学家不仅少有而且并不总是被归入史学界也显示出理

论在历史学研究中还是处于边缘。

现在历史学家了解并在他们的写作中引用理论家的观点已经很常见，引用的对象包括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埃米尔·涂尔干(Emlie Durkheim)，这些都是当代历史学研究中常见的名字。即便在历史学中理论出现的频率增加，这仍然不能被称作是一个真正的对话，因为历史学家很少发出回应。从不主动介入社会理论的辩论之余，他们只在提出思考时，运用社会理论，或借用社会理论的词汇来质疑史料或者构筑观点。例外之处就在于，历史学者积极介入社会理论论争。在这种理论性概念借鉴中，读者常会发现概念本身并不太恰当，要经过调整、细分，或者和其他明显不相干的社会科学联系起来才能被用于历史研究。如此可见，事实上历史学家对待理论的态度是批判性的，但对这种批判性的调整、细分、合并的思考几乎从未被记录下来。我们不仅回避质疑历史研究中突兀地借用理论是不是本身就有缺陷，也避免提出可能改善或代替现有观念的新词汇和理论框架<sup>[3]</sup>。所以尽管我们在实践中对社会理论常表示出批判态度，但对这些适用历史学者和其他专业学者的理论几乎没有影响。拜本学科的训练和当前主流的史学界文化所赐，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主动参与理论辩论的勇气。

我想在本书中指出：如此裹足不前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学家对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意见不仅重要而且有启发意义。在我看来，社会理论亟需融入史学的思维，当然这不能依靠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来完成。只有当历史学家们打破缄默，彻底审视并且重整我们从社会科学借鉴的理论，我们才能发展出历史学和社会学科共同追求的，洞悉这个时刻变动的世界的学说。



## 历史学家知道什么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自己所知的就是他们的研究课题：俄国革命、意大利城邦、印度洋贸易、罗斯福新政、明朝官僚制度、布尔战争、巴西流行文化等等，当然还包括如何应用和解读有关的出版物和史料。但在他们各自的研究对象之外，历史学家还懂得如何理解社会生活的时间性。因为历史学家的共同使命就是呈现历经时间流逝的人类活动。我们对时间的认知往往是模糊的，只有在表现特定的一系列事件或者是社群、国家或话语场域中所产生特殊转变的叙事中才具体显现出来。所以并不能说我们已经发展了关于社会性时间的理论。但我认为，事实上大多数历史学家对时间如何作用于社会关系的组织和转变有一些共同的设想，并且这些假设能够被概括性地提出。简言之，历史学家们已经形成了模糊的，或者可行的有关社会性时间的论述。我甚至敢说，这些已经相当精细复杂的理论远胜困扰社会科学大多数繁复难懂的同类假设。历史学家可以名正言顺地以社会性时间的论述投入社会理论的辩论中去。

然而，历史学家本身如何看待社会性时间呢？首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时间是决定性的；时间无法逆转，同理，已经完成的某个动作和经历过的某事件是不可磨灭的。它会留在受其影响的人的记忆里，并就此永远改变发生那一刻所处的状态。就像尽管我可以作出约定接着再毁约，但我曾经许诺某事的事实是无法撤回的。对我本人和知情人士来说，我从此就成了作出过承诺再撤回约定的与先前完全不同的人。当然，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所作所为不会改变当时的状况：在走廊里遇见同事时点头致意仅仅是强调我们在同个机构工作的事实，但这个简单的动作本身对我在工作机构（在我的个案中，是某校政治学系）中后续的社交关系非常重要。假如我之后不再有点头问好的动作，就

会立刻被注意到。如果是径直走过没有任何表示，这个动作可能会被认为带有暗示性，意味着我卷入了系内的派别之争，或者我打算稍后投票反对让这位同事升职。尤其是如果我再三这么做，缺少应有的问候将使我和被怠慢的同事关系紧张。两个动作——不管点头与否——都有后续影响；这会影响到我和那位同事乃至整个系的关系。更不用说更戏剧性的举动，比如在教职员会议中指责某位同事，或者激烈反对学系中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专业聘请新职位，或者邀请只有点头之交的同事合作授课或者合写论文，这些都将对系内社交的进行有更大影响。

尽管个人行为看似会造成决定性的社会效应，但其实每个行为都是另一个行为的结果，而且它是何种程度的结果将决定一个行为本身会造成什么影响。假如我最近已经好几次没有在遇见点头之交的同事问好，或者这位同事曾被已知是我朋友或者同伴的人冷落，又或是我近来曾经在系内会议上大肆抨击她的研究，我和这位同事之间的关系将变得严重不和。与此相反，假如我和她曾经在争取恢复学系的投票程序时站在同一阵线，或者业内最重要的期刊刚接受了她的一篇文章，我没有点头致意的负面效应将大大降低。历史学家相信不清楚时序就无法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这意味着历史学家认为任何行动、事件或者趋势的结果都很可能是偶然的，所以包括这一行动、事件、趋势本身的复杂却短暂的关联次序将决定它的效应。某个既有的事件的影响可能会被之前、之后或者同一时间发生的事件抵消、放大、偏转、加重、疏导，或是散布。某事的结果是偶然的，并不仅仅由更广泛的行动、趋势、事件决定，同时依赖包括其发生在内的确切关联次序。这意味着历史是不可预知的。

诚然社会学家们在私底下也承认时间的决定性。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一样认为，生育婴儿，决定换工作，被伴侣离弃，和窃取自己构思的同事做朋友，得知自己的孩子患有危及性命的重病，这些都对一个人的生活有重大且不可估量的影响。我认为其中的差异在于，尽管社会科学家也认同时间支配着日常经验，却拒绝把这个议题纳

入他们科学的理论框架里去。他们注意到了日常和个人经验的不可逆转，但从整体上看他们仍然认为这些存在意义上的变动完全是随机的。社会科学家由此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找到居高临下支配着日常生活中各种偶然事件和混乱的无上法则。而历史学家拒绝在研究中割裂日常生活和社会整体，同时提出个人经验中的社会实时性事实上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次。

历史学家用来分析社会生活的时间性的概念就是事件(event)。在他们看来，社会生活就是由意义重大的事情或者是将改变历史的一系列社会行动连贯而成。因此历史学家反复提及历史中的“转折点”或是“分水岭”，不惜花费大量的精力将历史的进程划分成不同年代，并用各种事件将它们分隔开来：汉朝的建立、十字军东征、印刷术的发明、宗教改革、工业革命、日俄战争、纳粹掌权、古巴导弹危机、电子媒体的兴起、柏林墙的倒塌，等等。在历史学家眼中，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日常生活中离婚、跳槽、在工作会议中发怒失态之类的普通事情一样具有改变我们个人生活轨迹的不可逆的社会实时性。尽管如此，历史学家并没有就事件如何造成了戏剧性的历史效应进行理论整理，他们只是无数次在叙述某个事件如何改变了历史或某个群体：牛津大学的研究员、上海劳工、纽约人、俄国人、罗马天主教徒，甚至是全人类。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为社会变动是平稳、渐进、可预知的线性过程，与之相反，历史学家们认为历史性时间波澜起伏、不均等、不可知而且是断裂的。

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带出了另一个关于社会性时间的重要假设，历史学家认为虽然在个人经验中并不突出，但时间是极度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集中了社会进程和各种偶然：渐进或者持续的社会动向，大众反复无常的声音，重要的突发事件，中程政治策略，意外的个人决定，游移不定的经济或者气候变化，然后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以特定方式发生，造成了特定的结果。时间性的多样形态是理论分析的一大挑战。缺乏以时序准确排列的前因，只知道长期纠结不

清的情势中片段的进程，我们该如何去分析结果？在一个事件中，到底是哪一个进程和怎样的偶然成为主导？短期的进程会在什么时候用何种方法，转变甚至使长期的进程付诸流水？而几乎被某个政治决断终止的长期进程可以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扭转形势呢？忠实地书写历史总不免要回答这些难解的谜题。

“以事件为本”的概念无疑假定不同的时期被改变的几率程度都不一样，也就是说，事件可能会“加快”历史的进程，同时还转变或者重塑了社会关系。于是他们认为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迥异的生活方式和动态。历史学家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时间是异质的：社会中存在怎样的实体、它们如何运作以及它们自身的含义都随时间彻底改变。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无时不处于混乱之中；历史学家假设的社会性时间永远同时包括持续和变化。但我们正讨论的假设是，社会关系的任何主要表现形式都有可能被改变：不仅是理念、制度、身份，还有工具、住所的样式、性、神灵、气候、疾病、作物和语言。换言之，历史学家暗示是文化组成了社会生活，而且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塑造了从农业、生产到诗歌宗教在内社会生活所有层面的人类实践、发明和信仰。而虽然文化都是人为的，但不论无心还是故意为之，人类也具有毁坏、歪曲、忽视、遗忘或者激进地重塑文化的能力。

时间的异质性意味着因果异质。也就是说，某个行动的结果并不是自发的，而是由其发生的环境本质所决定的。当主流社会科学家的行为模式就是发现和运用独立于时间空间的普遍性因果法则时，这种看法无疑格格不入。典型的例子就是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所有的社会角色都在实践效用最大化，而且供求法则是万能的。历史学家当然也承认某些时期存在普遍性因果规律，但过去和现在并不是被同一套法则所支配；他们认为决定现在的社会法则和过去的截然不同，重新发掘并且厘清过去的因果规律就是历史学者的任务。

时间的异质性也意味着要在历史的情境中理解和诠释社会行为。我们无法脱离当时的语义、技术和习俗(简言之即逻辑)去理解某个动作

或者话语及其后果。比起用普遍性规律去诠释，历史学家倾向将事物和它所处的背景联系起来。

假如事物所在的世界具有时间异质性，那么历史学家对年代的执着完全是合理的。事件发生的准确时序时间如此重要是因为：如我所说，历史学家坚信，不知道发生的顺序我们就无法了解某事如何发生或是具有何种意义，只有一丝不苟地专注于年代才能保证掌握可靠的事实。同时，年代顺序的重要性还在于行动和事件的意义都依赖其所处的时代情境。只有清楚知道社会状况在同一“历史时期”内——也就是说有某些历史规律作用于其中——的时间界限，我们才能理解社会实际之间的联系。年代的先后顺序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为我们指出了诠释行动、文本或是制成品的时候应该代入的历史背景。要理解社会行动之间的关系，就需要知道社会事实的时间边界是否被放在了同一个“历史时期”里，也就是说，是否在某个特定历史的逻辑中。正因为时代告诉了我们，在试图解释或者阐释的时候，必须把行动、文本或者物质产品放在怎样的历史环境里。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想指出，历史学家关于社会性时间的一系列模糊设想，如决定性、偶然性、复杂性、事件化和异质性，都是一致的；注重年代、时序和背景的方法推论也和理论相符合。尽管现在的许多历史学家会反对我这番构想中的一小部分，但大多数人还是会大体上认可这些也是为他们而设的理论。我特地抽象化了这些理论，所以即使是认同大意的历史学家也会对其中值得商榷的论点予以抨击：何为充分的情境化？什么社会因果关系会因时代而异？怎样的事件才具有“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在某一次转变中，什么是偶然，什么是必然？

尽管尚未清晰，但历史学家用努力和智慧提出了社会性时间的概念。但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止步于此。对他们来说，对社会生活的时间的理解只是习以为常的事实，而非理论的一部分。通过研读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并内化他们叙述历史的方式，历史学家们从学习和吸收知识的过程中认识到时间性的理念。他们对社会性时间知之甚详，

但只当这是学术研究的常识，甚至是因为这个学术常识和个人经验时间性中感受的常识基本一致。此外，经验告诉我过分依赖叙述会给历史学家造成困扰。在论证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喜欢用叙述来解决问题，尝试从史料中挖掘更多细节并依赖越来越多的样本、实例和秘闻。这通常意味着到最后，重要的概念性难题——有关时间的动因、因果关系、事件或实体间联系的本质——并没有被安置于适宜的理论中，而是将被叙述的细节湮没。历史学家或许是社会性时间的专家，常常因为理论意识太不成熟而没有从理论层面了解他们的知识。

还必须指出的是，许多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关于时间性的假设都比主流社会学科的观点更接近我在前文概括的历史学家的模式。诚然，我在本书中有关历史学概念化时间性的多数例子都是由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而非历史学家收集的<sup>[4]</sup>。选择这些例子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很有必要说明对时间性的严密理解并不是历史学家独有的；同时部分原因是因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由历史学论点衍生的理论问题比历史学家们更敏感。社会科学家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知觉十分敏锐，但他们对时间性的设想通常并不清晰，尽管现在看来已经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理论对话的初始阶段。所以这再次说明更完善的理论对话将使历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双方受益。

## 社会科学家知道什么

社会科学家比历史学家对理论更有自觉，所以由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理论对话是很合理的。发起对话的同时，应该留意到社会学科内在的多样性，不管是学科内部还是学科之间。把历史学排除在社会科学之外的学术界专门化过程，同时也在社会学科内部划下界限。在美国，大多数社会科学的主流认识论都是实证主义的，但人类学却转向了迥异的解释主义领域。社会或者文化人类学家的理论设想大多和

历史学家更为接近。事实上许多人类学家更关注的是人文学者而不是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家的著作。形成对比的是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精确和量化的学科，与此同时社会学、政治学和地理学却被理论和方法的争端严重割裂，正如社会学中象征互动论者(symbolic interactionists)\*和人口统计学者(demographers)\*\*在认识论上几乎没有交集。社会科学家在理论观点上的多样性说明，展开历史和社会科学之间对话的想法是过分简化的。和人类学家的对话从形式到内容都会和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之间的不一样；与人口统计学者的对话也和与象征互动论学者的对话不同。也不是所有社会科学家都擅长或乐于和历史学家对话。大部分进行“主流”定量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在理论设想上和历史学家如此矛盾，可以想见两者之间进行交流会是怎样的对牛弹琴。[5]

实际上，历史学家最有价值的对话对象是那些对历史和文化问题感兴趣、使用或至少乐意支持“阐释”或者“定性”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家。几乎所有写过人们所说的“社会理论”的社会科学家都可归入此列，正如大多数社会或文化人类学家。但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地理学这类主要的实证和定量研究领域，这样的社会科学家是持罕见的少数。以本人经验来看，倾向阐释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对与历史学家进行理论对话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自己学术领域中的防备意识。我在本书中致力提出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历史”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普遍对话，而是更明确要与那些已经做好准备、一同为共享的事业合作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与此同时，有必要认识到历史学家的理论见解并不只对研究特定历史题材的社会科学家有意义。因

---

\* 持象征互动论的学者认为，人类行为所基于的意义是由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产生的，并在阐释意义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于是，理解人类最好的方法便是解读人类与所在环境之间的关系，带有强烈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特点，以建构出的象征作为解读介质和意义载体。——译者注

\*\* 人口统计派的学者用计量的方法对人类进行研究。其与象征互动论最直接的差别在于使用量化分析，而非定性分析或阐释。——译者注

为社会世界事实上时刻都在变动着，并因为这个世界是由复杂而偶然的时间建构而成，所以这对研究当代社会世界来理解历史的逻辑的人，以及对研究过去的人来说，都同等重要。

除了相对较高的理论敏感度，社会科学家认为他们还能与历史学家的对话带来些什么呢？在我看来，社会科学家最宝贵的就是他们对结构性思考的强烈嗜好，不管是阐释主义还是实证主义者都一样。与偏好多种因果关系和详细基于事件叙述的历史学家形成对比的是，社会科学家更倾向在社会少数持续、确定、有影响力的特征中寻求答案，例如阶级关系、支配性的意识形态、长期的职业或人口分布、重要的经济利益、顽固的文化信仰或者是组织的固有特性。历史学家满足于多个不明确但最终在因果上相互交织的可能性，社会科学家则尝试厘清在因果关系中最重要的环节并完整解释它们系统性的动态。用清晰定义的结构特征解释现象，对研究者理论和方法的了解有更高的要求。在我看来，结构性思维是社会学科中值得历史学家迎头赶上的长处。事实上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令历史学家从社会理论借用更多观念的原因正是为了把结构性方法引入历史研究。

但社会科学家的结构性思维的不足是缺少时间性假定。在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中，“结构”至少算是如同社会现实一般或是决定了社会变动如何表现的内在规律的固有模糊概念。社会行为、习俗的某些特征，或者特定的信仰和理念虽然形形色色，但这些不同的外在表现都被视为内在规律在发挥作用。在社会科学的语境内，词汇通常止步于结构。只有把社会文化的变动都归结于结构——制度设置、职业分布、性别成见、二元对立的分类法、消费习惯等等——的时候，才能说这是完整的诠释。问题在于内在的因果规律随着时间流逝也发生了突变或是转型，它们也有自己的历史。许多社会科学家虽然意识到社会结构初始的特征，却不知道应该如何着手。本人认为，这是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互惠互利的理论对话最清晰的理由之一。他们都需要各种与时间的历史性概念相容的各种结构性思考。



另一个值得历史学家学习的宝贵思维来自社会学家中的少数派历史社会学家，他们对解决终极历史问题表现了强烈的意愿。注重史料、精确的年表和具体叙事的历史学家，往往缺少勇气解决自身学术专长以外的问题。截然不同是历史社会学家向来乐于提出最重要的问题，例如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现代性的诞生，革命的机制，皇权的统治，以及文明的兴衰。<sup>[6]</sup>历史学的学术规范要求历史学家熟练掌握历史文本而且要能够阅读原文，社会学家却少有这些顾虑。这使历史社会学家得以自如地寻求历史学家关心却无力进行研究的广阔的历史格局。通过提醒我们留意还有更重要的问题存在，并向我们提出挑战，历史社会学家同时也开阔了历史学家的视野。<sup>[7]</sup>

社会科学家具有值得历史学家仿效的重要长处，但也有不足之处。根本上，多数主流社会科学家都被他们对自然科学模式的迷信所阻碍，批判不足，阐释主义者恰如其分地称其为“艳羨物理情结”（physics envy）。自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在 19 世纪早期奠定了“社会学”的基础，社会学科的理念就成了追求物理学在伊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时代已经达到的精确度。孔德的蓝图从此众口相传：研究自然现象的自然科学将最早成为一门科学；其次是研究对象较为复杂的生物学；尾随其后的社会学（或者我们称其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最为复杂，所以最后完成科学化的过程。由此可知社会学科是未成熟的科学，它必须效法先辈，尽可能采用严格的“科学方法”，用数学和量化数据来自我完善。在近几十年里经济学已经彻底修炼成功，在自然科学模式的代言中仅次于物理学。

有人也许觉得奇怪，创立一个半世纪之后一门科学居然还“不成熟”，甚或是仍然受限于早已被超越的牛顿式物理学。用数学方法使社会学科变得更准确的尝试屡战屡败，似乎证明了新孔德式的蓝图不可能实现，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多数美国社会科学家看来，放弃我们面前这个极其有力的历史结构、艰深的知识迷思就等同于放弃追寻严密的社会学知识。正如我稍后在第三章中所说，以历史学家在社会学科中